

● 历史学

古夏口城地望考辨

石 泉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石 泉(1918-), 男, 安徽贵池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流行的传统说法一直将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定在今武汉市境内, 实误。本文从原始文献特别是汉魏六朝时人的有关记载出发, 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 通过细密的考证与分析, 初步认定古夏口城实当位于汉水中游今钟祥市或稍南处; 正是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 位于钟祥的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由钟祥迁移至今武汉市。

[关键词] 夏口; 地望; 武汉; 钟祥

[中图分类号] K 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437-09

一、前 言

本课题是研究武汉市历史地理所必须澄清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即古夏口城是否为今武汉市的前身? 本文依据经过鉴定的原始材料与客观的科学论证, 得出了突破性的新解, 认为: 至迟上起东汉末, 历三国、两晋、宋、齐以至梁末(公元3世纪到6世纪中叶)的古夏口城实应位于汉水中游、今钟祥[市]城(或稍南)有山险处, 而非如中唐时主要的权威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图已佚, 以下简称《元和志》)以后形成的传统解释, 定在今武汉市。

关于古夏口城在今武汉市的传说说法, 又有两种解释: 一说在今武汉市汉阳区之汉水入长江处, 其入江处之山险则以今汉阳区之龟山当之; 另一说则认为在今长江东南岸之今武汉市武昌区。《元和志》卷27江南道三“鄂州”总序云:

州城本夏口城。吴(大帝孙权)黄武二年(公元223年), 城江夏以安屯戍也。城西临大江, 西南角因矶为楼, 名黄鹤楼^①。三国时, 黄祖为(江夏)太守, 吴建凌统攻而擒之。

此二说各有所据, 互不相下, 而症结则在于未能识别

梁末以前之古夏口城与今位于武汉市之后世夏口城并非一地, 误将二者混为一谈所致。

宋代以后, 又有调合之论, 认为古夏口先在今长江西北岸、汉水下游、龟山北麓与长江汇合之上, 后来才迁到今武汉市之武昌区。这与《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所记“黄武二年(公元223年)春正月, 城江夏(郡)山”, 亦可大致相合。虽不能确证其所“城”必在夏口城(正式名称是“沙羡县”), 但夏口城必在江夏郡沙羡县, 则无可疑^②, 否则黄祖岂得以“江夏太守”而镇夏口?

然而, 在我们看来, 无论是汉阳说、武昌说, 还是先汉阳、后武昌说, 都是难于成立的。古夏口城并不在今武汉市一带。

二、古夏口城不当在今武汉市

1. 由汉水、大别的相对方位, 证古夏口城不当在今武汉市一带

夏口位于汉水南入长江、附近并有山险处, 自古即有明确记载。《南齐书》卷15《州郡志》“鄂州”总序云:

鄂州, 镇夏口, 旧要害也。吴置都督, 为鲁口屯, 对鲁山岸, 因为名也。晋永嘉中, 荆

州刺史、都督山简自襄阳避贼奔夏口。庾翼为荆州，治夏口，并依地险也。……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冠军将军刘毅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势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沔沔(泉按：值得注意的是，于此独不提长江)，请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夏口城据黄鹤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沔(泉按：此处又未提长江)，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

另，《水经注·沔水篇》(王先谦，长沙王氏合校本，卷 28)云：

[经](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县北，南入于江。[注]庾仲雍(按：刘宋时人)曰：“夏口亦曰沔口矣。”《尚书·禹贡》云：“汉水南至大别入江。”《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 504 年)，吴师伐郢，楚(令尹)子常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曰：“二别，近汉之名，无缘乃在安丰也。”按：《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则与《尚书》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

泉按：关于春秋晚期汉水东流转南入江问题，拙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有详考，请参阅。又，《江水篇》(合校本，卷 35)云：

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山北翼际山旁也。”……《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夏口)城中有晋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碑，又有平南将军王世将刻石，记征杜曾事。……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羨县治。……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鹤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澹洄淤浦，……亦商舟之所会矣。船官浦东，即黄鹤山，林洞甚美。……山下谓之黄鹤岸。岸下有湾，目之为黄鹤湾。黄鹤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壙藉阻，……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羨县治也。

《水经注》经后人(主要是唐以后)“订补”，因其地理观念之异，盖已非本来面目；古翼际山未必即今之汉阳龟山(对此，将于另文详考)；今本《江水篇》的结构

错乱，尤为其甚；至于注文中的长江流域以南诸水，由于郦道元未尝亲履其地，就更是只能凭所见之文献记载与传闻之辞了。但无论如何，《水经注》局部段落仍有可信之处，只是必须与其他可以凭依的材料相互印证才能引据而已。例如：上引这段《水经注》在与《南齐书·州郡志》相印证之后，即可局部予以凭信。现在，问题的关键落在了古人心目中的汉水入江之处究竟在哪里？其所邻近之山险又在何处？这是为梁末以前的古夏口城定位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尚书·禹贡》及汉晋时一系列记载皆云：汉水东行，至大别，南入于江。今汉水则基本上是东行入江(略偏北)，彼此不合。大别位置，前人亦有二说：

(1)安丰西南说(亦即古大别即今大别山区说)。此说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卷 28 下，六安国“安丰”县原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郑玄注谓“大别在庐江(郡)安丰县”实为因袭班氏之说^①。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郡国志四》庐江郡“安丰”县下原注也有“有大别山”的记载，说明在东汉至西晋初人们的观念里，《禹贡》大别山在当时的安丰县境。汉晋安丰县的位置，《水经注·决水篇》中有详细描述，其文云：

[经]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北过其县东，又北过安丰县东。[注]决水自雩娄县北迳鸡备亭，……安丰县故城，今边城郡治也，王莽之美丰也。

对照今地图，可知决水即流经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境之史河，古今于此无异辞，则汉晋安丰县当在今河南固始东南境史河中游西岸，当无疑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2 册第 24—25 页西汉“扬州刺史部”、第 51—52 页东汉“扬州刺史部”都据此将安丰县治定在今固始县东南。汉代安丰县既在今河南固始县，则当时人观念中的《禹贡》大别当然在今固始南；结合《水经》(反映东汉时人的地理观念)关于决水出雩娄县南大别山的记载，可知汉代大别山已定在今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同名山地。前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两个有关图幅将两汉大别山定在今大别山一带，是有道理的。

安丰西南说在两汉时虽流行，但其说与《禹贡》所记不能相符，将此大别指为《禹贡》所记之大别，去汉水实过远。故唐宋时，此说不显，甚少人提及，唯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大别山在六安国安丰县，今土人谓之甑山。”^②甑山，历来都以为是小别所在，今属湖北汉川境，司马贞却指为大别，实误。但到了清代，清儒尊崇汉学，颇以班、郑之言为是，又重新提出安丰西南说；而为了调和班说之与《禹贡》大别为汉水

所经的矛盾,乃将大别之范围逐渐扩大、南移,使其包括今豫东南、皖西和鄂东北的广大山地^⑧,杨守敬并提出了古汉水下游较今河道要向东摆动延伸、至阳逻入江的看法^⑨。

此说之难以成立,原因有二:其一,《禹贡》明言,大别为汉水所经,且当汉水东流转南入江之处,当无疑义。将此大别定在今鄂豫皖交界之同名山脉固然距汉水过远,即便是定在今湖北孝感、大悟一带,似亦与汉水不能发生直接关系。而最为重要者,《禹贡》导山部分书某山至于某山,皆指一条山脉或其一段而言,前人于此已有论述^⑩。因此,《禹贡》大别绝无可能是指一大片山地,为了将大别与汉水联系在一起而将其范围不断扩大成一大片山地丘陵的做法,在思想方法是错的。其二,大别、小别地望的定位,须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的军事地理相结合才能确定,而吴师入郢之役的军事地理又牵涉到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对这些地名的考证表明,大别与小别都不可能在今大别山区或鄂东山地。(详下文)

(2)江夏说(即大别为今汉阳龟山说)。此说最初的依据是《左传》杜预注。《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4年)记春秋晚期吴楚之战云:“(楚令尹子常)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杜预注节引《尚书·禹贡》“汉水至大别,南入江”后,释云:“然则此二别在江夏[郡]界。”《水经注》卷28《沔水篇》则言之稍详,并加引《地说》为证,称与《尚书·禹贡》及《左传》杜预注相符,最后则云“今不知所在矣。”然杜、郦皆未指明二别之具体地望。唐人重杜注,故于杜氏之说颇多发挥,至李吉甫编集《元和志》,乃正式提出大别为汉阳鲁山(即今武汉市汉阳区之龟山)、小别为当时的汉川县东南50里之甑山的说法^[1](卷27,第648页)。后世因袭其说,以迄于今^⑪。

然此说也有其难以解决的矛盾。首先,它与汉晋人以至六朝下及唐初有关“大别”的原始记载不能相合。《禹贡》、《地说》(东汉后期以前的著作)^⑫、蔡邕《汉津赋》等古记载都反映出,汉水是东行,阻于大别山之后,南回入江,则大别只能在汉水东北方;而今武汉市汉阳区的大别山(龟山)却是在汉水南面,绝无法使东流的汉水南转入江。其次,从地貌学的角度看,此说法也存在很大问题。今长江汉阳河段的流向是东北流,像汉水这样东流(稍偏南)至接近长江的汉阳大别山(龟山)附近以后,只能继续东流入江,绝不可能违反地形,转而南流,注入东北流的长江;因为若是如此,必将使汉水入江处的水流形成转南的一个急湾,而这必须有特殊的地貌条件才行,但武汉附近汉水入江处却并无这样的地貌条件(这里是台

地,汉水无从南流)。因此,把《禹贡》汉水东至大别、转南入江的记载,解释为即今汉阳大别山(龟山)和附近的长江,是根本讲不通的。前人因无等高线地形图,致有此误,而洪亮吉《大别山考释》列举14证,驳《元和郡县图志》以来之大别即汉阳龟山说,又从文献史料的论证上作了进一步补充^⑬。关于此点,拙作《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一文之“(五)大别、小别”部分已有详考^[2](第380—386页),请参阅,此不赘述。

《禹贡》大别既不能为今之汉阳龟山或鄂豫皖边区之大别山地,则与大别关系密切的古夏口城自亦不能在今武汉市。

2. 由晋宋齐梁时的有关记载,亦可证当时的夏口城不能在今武汉市

(1)从夏口与武昌的距离较远,可知夏口不在今武汉市。《晋书》卷73《庾翼传》记庾翼于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拟率军北伐,“至夏口,复上表曰:‘……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当时的武昌在今湖北鄂州市。夏口如在今武汉市,则去武昌(今鄂州)路途颇近(今公路82公里,过去传统的官里为170—180里),据当地人谈,由鄂州市到武昌,上水行船,双人划桨,小船一天半可到;运货大木船需2日;如顺风扬帆,则1天可到。庾翼水军行船,划桨者众,应能更快,即使稍慢,也不致用五六天之久。如系陆行,用时更少(水路弯曲,又逆流上溯)。由此亦可推知当时的夏口似不能在今武汉市,而当更在汉水上游,才讲得通。同时,《宋书·州郡志》记当时的鄂州治所夏口(当时又称“汝南城”,是侨县)“去京都水(路)二千一百(里)”,而武昌郡治“去京都水(路)一千一百(里)”,则当时武昌郡(治所在今鄂州)与鄂州之间的距离为1000里。虽然《宋书·州郡志》有关道路里程的叙述颇多矛盾,未可尽信,但两证相结合,似应可信。

(2)《晋书》卷3《武帝纪》云:“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如按流行说法,定夏口在今武汉市,则与武昌(今鄂州市)所距甚近,王戎与胡奋兵分两支实无必要。同书同卷太康元年二月(公元280年3月)又记胡奋攻克江安。按:江安,流行说法认为在今湖北公安县城(长江中游南岸);而据我们所考,则当在汉水中游西面今钟祥西北境^[3](第51—72,127—160页)。无论采用何种说法,皆距今武汉市甚远。如果胡奋所攻之夏口即在今武汉市,则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又转攻江安;夏口之所在必与江安较

近,才有此种可能。这也说明当时的夏口城不能在今武汉市。

3. 从政区沿革证古夏口城不在今武汉市

夏口城自刘宋中期以后,一直是郢州治所,而隋、唐、宋时期的郢州治所一直在长寿县(今钟祥市),州名定位在此,必有渊源。《隋书》卷 31《地理志下》于“竟陵郡”(治长寿县,即今钟祥市)和“江夏郡”(治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下的原注却都说“旧置郢州”,而且都联系到梁时曾从郢州分置北新州,形成自相矛盾的记载。唐宋名著如《通典》、《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则一致认为夏口及六朝时的郢州在江夏县,《通典》、《太平寰宇记》并照引《隋书·地理志》“江夏郡”下关于北新州以及“寻又分北新,立土、富、洄、泉、豪五州”的原注^①。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则否定了江夏郡有北新州之说,指出:“梁之新州在京山,则江夏郡在南,安有‘北新’之名?”认为梁北新州当在隋竟陵郡,而后来由北新州分出的土州当在隋之汉东郡土山县(在今随州市境内)、富州当在隋安陆郡富水县(在今京山县东北之宋埠镇),皆近长寿(今钟祥),而去江夏(今武汉)较远^②。按:杨守敬所驳甚是,但仍有未足。从《隋书·地理志》“竟陵郡”和“江夏郡”原注中还可以看出,梁之新州和北新州,与当时的郢州密切关连,位于今京山县境的新州之设立,就是梁郢州刺史元树平定当地蛮族反抗之后的措置^③,而梁之郢州治所与宋齐时郢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应将宋、齐、梁时的郢州与新州、北新州联系起来,加以定位。杨守敬既已辨明北新州不能在隋江夏郡而应在竟陵郡之长寿县境(今钟祥境),则竟陵郡下原注所说之“旧郢州”就应与隋唐宋之郢州同为一地。换言之,宋齐梁时的郢州治所(夏口)也就在隋唐宋时的郢州治所,即今之钟祥市。否则,如按流行说法,郢州历宋齐梁陈,一直在今武汉市,则隋灭陈后,理当继续沿用,何以立即改名鄂州,而将郢州之名又恰好定在长寿县(今钟祥市)?

三、古夏口城当在今钟祥市或稍南处

汉末三国以迄于齐梁时的夏口城既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汉市,则其地又当在今之何处?我们上文梳理宋齐梁至隋唐时郢州沿革时,已初步证明宋齐梁之郢州实与隋唐宋之郢州同为一地,即在今之钟祥市或稍南处。这一初步结论还可以从大别、夏水、蒲圻、下雩等相关山川城邑的定位以及赤壁之战等重要战役的军事地理分析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证明。

1. 从竟陵郡治及绥安郡境近夏口来证明古夏口当在今钟祥

《南齐书》卷 14《州郡志上》“江州”总序引东晋末何无忌(时任江州刺史)上表云:

竟陵(郡)去(江州)治辽远,去江陵正三百里,荆州所立绥安郡民户,参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还荆州。

竟陵、绥安两郡,即便按照传统说法,也是在今钟祥、荆门间。而据我们考定,竟陵郡治当在钟祥北境丰乐镇,郡境包括汉水中游东岸今钟祥、京山、天门等县境^[2](第 127—157 页);绥安郡治当在今荆门东北境,郡境当在竟陵郡以西的汉水中游西岸地^[4](第 29—34 页)。如果夏口在今武汉市,与竟陵、绥安二郡治相距颇远,怎么能说二郡的“郡治常在夏口左右”?

2. 从古大别地望证古夏口城当在今钟祥市或稍南处

《禹贡》、《左传》等先秦至汉晋文献中所见之大别既非今武汉市汉阳区之龟山,亦非今鄂豫皖边区之大别山脉,已见上文。《禹贡》大别即汉阳龟山(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小别即今汉川甑山)之说虽然不能成立,然杜预提出的“二别”在江夏郡之说虽颇笼统,却大致符合实际情况。他提示我们,要确定大别、小别地望之所在,必须返本探源,重新回到《禹贡》与《左传》的有关记载,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探讨。

由《禹贡》、《地说》以及伪孔《传》(成书于东晋时)、《汉津赋》等古记载中可以看出,汉水东流,阻于大别山,于是转向南流入于江。转南之前的汉水又称沧浪之水,即今湖北丹江口至襄阳以西的汉水河段^④;而汉水流至大别以前所过之“三澨”,当在襄阳以东或以北不远的汉水滨^⑤;大别在三澨东,汉水转南处,则当距襄阳不远。蔡邕(东汉末年人)《汉津赋》说汉水东流,先过曼山。曼山即今襄阳城西 10 里、汉水南岸之万山^⑥。今汉水东流过万山北面之后,即东北向,正符合“过曼山以左回”的描述。下文紧接着说:“旋襄阳而南紫”,又正与今汉水东流绕襄阳城东北流然后折向南流的地势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汉津赋》下一句立即提到“切大别之东山”,这说明大别应在汉水东行转南时的东岸,也就是今襄樊市东面的东津湾一带高地,亦即横亘于鄂中的大洪山脉北端西麓之余脉。汉水东流至此,受到大洪山脉的阻隔,乃转而南流,这与上引《禹贡》、《地说》、伪孔《传》等所记汉水东流触大别山阪而转南的流向正合。

将大别定在此处,与经过重新细致考订的春秋

吴师入郢之役的军事地理形势也相符合。关于这一问题,拙文《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已有详证。考订这次战役军事地理的关键地名是豫章、唐国、冥阨、大别、雍澁、清发、柏举等战地,这些地名的位置既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又各有其自身的原始材料可证。通过详密的考证,认为:(1)吴师“自豫章与楚夹汉”之豫章,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江北淮南,而当如杜注所说,近汉水,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东北、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亦即河南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即《水经注·涓水篇》(合校本,卷31)所记之“豫章大陂”。此豫章近汉,由此豫章始能与“楚夹汉而阵”。(2)吴之盟国唐国也不在流行说法所说的今湖北随州西境,而当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境。(3)沈尹戌所说的大隧、直辕、冥阨也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鄂豫交界的桐柏山脉武胜关一带(即六朝时的“义阳三关”),而当是楚方城(今豫南确山以西至泌阳以东地区的长城山丘陵地)的三个隘口。(4)吴楚两军决战之地柏举不可能在今湖北麻城境,而当在襄樊市东北、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下游附近地区;清发也不当在今安陆境,而当在今襄阳西北之汉水支流清河下游;雍澁为“三澁”之一,在襄阳北汉水北岸、今樊城一带;大别也在襄阳东之汉水东岸,已见前述。小别地望,无直接的古记载可供考证,从楚师济汉之后,“自小别至于大别”,与吴师三战不利的情况来看,小别当近大别,也应是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丘陵地上的一座小山,或在大别稍南处。这样,吴师入郢的军行道途就是:首先自本国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国境内登陆,会合蔡师,共同西进,越过楚方城南段的隘道到达唐国,会合唐师,继续沿今唐河岸西南进,自豫章大陂进到汉水北岸,与楚军夹汉对峙。然后楚令尹子常率大军渡过汉水,在汉东(偏北)的小别、大别向吴反攻,双方随即于大别西北的柏举展开决战,楚师大败,向清发(今清河)溃退,被吴师追及,又败;南退至汉水北岸的雍澁(今樊城附近),又败。于是,吴师渡汉水南下,迅速攻陷了楚郢都。

将大别定在襄阳东、汉水东岸的大洪山脉之北端,显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现在的汉水是由襄阳附近折向南流后,经数百里,到沙洋、潜江一带,又转东流数百里,而东入长江的,入江处且稍偏北,这将如何解释汉水东流至大别而“南入于江”呢?对此,可以作如下解答:

汉水南行至钟祥以下,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并转向东流,这里就是现在的汉江下游河段。对江汉平原湖泊成因与地质钻孔资料的分析表明,这一地区的

第四纪地层是河流相沉积旋回的多次重复,说明该地区在第四纪时是河湖交错的地貌景观,因而江汉平原的发育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泛滥平原。也就是说,在第四纪的很长时间内,汉江下游河道非常不稳定,曾有多次迁徙^[4](第97—157页)。有关调查指出:从钟祥以下,东至汉口,西迄沙市,南到长江边,都是汉水泥沙堆积的地区。这说明在沿江堤防未修筑之前,汉江下游河道常常变迁^[5](第27—30页)。而长江江陵以下荆江河段也非常不稳定。不难想像,本段汉江如无江汉干堤,在洪水时期势必为江汉洪水交搏地区,一片汪洋。而在洪水退后,则为河湖交错的地理景观。直到明末清初,《读史方輿纪要》卷127川涑四“汉水”条转引当时(或稍早)的地方志,仍对汉水下游作过这样的描述:

汉水由荆门州界折而东,大小群川咸汇焉。势盛流浊,浸淫荡决,为患无已。而潜江地居汙下,遂为众水之壑。一望弥漫,无复涯际。汉水经其间,重湖浩淼,经流支川,不可辨也。

明末清初的著名地理学者对江汉平原上的汉水下游印象尚且如此,上至先秦两汉之时,江汉平原远未开发,不可能修筑堤防;而且自春秋以迄于汉初的500多年时间里,正是我国气候的温暖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要比现在湿热得多,汉江流域的降水量也比现在大^[6](第15—38页)^[7](第268—277页),因而汉水下游与荆江两岸洪水漫流、河湖泛滥的情况当更突出。古人面对上引《读史方輿纪要》所述的状况,从而认为汉水南流至此,即与江水交汇,是很自然的事。若果如此,则将大别地望定在今襄阳东、汉水东岸、汉水东行转南之处是可以讲通的。

大别既在襄阳东之大洪山西麓,汉水南流入江处在今钟祥市南、潜江市的泽口以北(今汉水由泽口转东)的汉水中游河段有山处,则与大别相近、处于汉水转南入江之处而且附近有山险的夏口就只能在今钟祥一带去寻找。据六朝时的一系列记载,夏口城隔汉江对鲁山城,夏口城南还有偃月垒,又称却月城,三城各据山丘,互为犄角^⑧。汉水中游河段的南部,具备这样地理形势的地方,只有今钟祥市城关附近或稍南处。今钟祥市区西部为高丘,对岸则为三尖山之东南支脉黄土坡山。市区南面也有丘陵,地形与三城位置颇合。

3. 由夏水源流看古夏口地望

古夏口之得名,与夏水有密切关连。《汉书·地理志》南郡“华容”县原注称“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则夏水为“江”水的一支别流,出自汉代华

容县境,东流入沔(汉水)。成书于汉魏时的《水经》谓“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自唐初以来,由于流行说法一直把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时的江陵城定在长江边、今荆州市北境的“纪南城遗址”(江津在其东南不远处,被认为即今之沙市),汉魏六朝时的华容县定在今监利县东境,云杜则在今仙桃与天门两市之间,这样,古夏水的源流就成为自今荆州东南,枝分江水,东(偏北)流经今江陵、监利、潜江、仙桃等县市,在今仙桃市附近注入汉水^⑧。然江汉平原的地形实是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决定了平原西部与中部的河道只能是东南流,而不可能东北流。换言之,流行说法关于古夏水源流的解说在地形上是讲不通的,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出发,我们经过考证,结合古江陵、华容、监利、云杜等地名的重新定位,可以进一步认为古夏水所受之“江”当为今蛮河(古沮水,亦称“江”),分“江”之处在古江陵(今宜城县南境)东南的江津(今蛮河下游北岸的璞河璠附近),东南流经今宜城南境、钟祥西北境,大约在今钟祥西北境流入沔水(亦有“江”称)。其入沔之口距我们所考古夏口的所在钟祥城或稍南不远处,则夏口城位于夏水入沔之口附近是符合实际的^[8](第 47—55 页)。

4. 从相关城邑的定位看古夏口地望

(1)刘宋元嘉十六年(公元 439 年)始设巴陵郡,领 4 县,其中巴陵、下雋、蒲圻 3 县原属长沙郡,另有江夏郡之沙阳县^⑨,则此 4 县必相邻近。巴陵、下雋地望,据拙作《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所考,当在今钟祥西北境、涢河北岸^[3](第 44—49 页);蒲圻则当在下雋东南、今钟祥西北境丰山口以南地区^[2](第 30—31 页)。沙阳更在蒲圻南邻、夏口北邻,据此,则夏口城亦当在汉水中游的钟祥附近。

(2)必须回答的一个疑问:如何解释孙吴时沙羡县的铅地券在今武汉市武昌区境内出土?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界曾在武汉市武昌任家湾、莲溪寺孙吴墓葬中,发现了吴大帝孙权黄武六年(公元 227 年)和景帝孙休永安五年(公元 262 年)的两个铅地券,券上都写明墓主死葬之地在“沙羡县界”,这就确证孙吴时期的沙羡县境是在今武汉市附近,正与流行说法定沙羡、夏口在今武汉市相合^[9,10](第 65—73 页;第 189—190 页)。如按我们新解,沙羡定在今钟祥附近,将如何解释此 2 铅地券的吴时沙羡县境在今武汉市?

对此,我们的解答是:如按流行说法,认为沙羡始终在武汉市,则铅地券上的沙羡县就与《宋书·州

郡志》中一系列有关沙羡的记载,发生了无可调和的矛盾。《宋书·州郡志》鄂州江夏太守“汝南侯相”条云:

本沙羡土,晋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为汝南县。沙羡今,汉旧县,吴省。晋武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复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公元 378 年),省并沙阳,后以其地为汝南实土。

又“沙阳男相”条云:

二汉旧县,本名沙羡,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更名,又立沙羡,而沙阳徙今所治。

这两段记载都明言沙羡县在孙吴时曾被省废,而且后来在此地改设沙阳县。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晋灭吴后,又重新在夏口恢复沙羡县,而移沙阳县址于夏口以北、蒲圻县南。流行说法既引铅地券及《三国志》为证,就必须否定《宋书·州郡志》所记全部内容。于此,应指出:首先,吴时并未废省沙羡县^⑩,因而也就谈不上在沙羡原址设沙阳县,更谈不到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重立沙羡于夏口的汉县故址,并相应地又把原设在夏口的沙阳县治迁往新址等等。然《宋书·州郡志》所记内容具体,沿革清楚,又与《南齐书·州郡志》及《水经注》所记相符^⑪,岂能轻易否定?二者不可得兼,彼此又不能相容,这就使流行说法左右为难,陷入困境,而其根源则在于定沙羡始终在武汉市。如按我们的新解,汉晋沙羡(夏口)在今钟祥,这一矛盾就可迎刃而解。《宋书·州郡志》所记孙吴时废省的沙羡是汉县,属江夏郡,即古夏口所在,而铅地券上的沙羡,则是公元 220 年吴建立武昌郡时新设同名的属县之一。此县共延续 60 年(公元 220—280 年),晋灭吴,始废省,又在夏口恢复了原沙羡县。两个沙羡同名异地,却不同时。弄清这一点,则铅地券与《宋书·州郡志》所记相互矛盾的有关沙羡的材料,就可各得其所,互为补充,而且沿革也更完整了。

5. 由宋至明的有关记载证古夏口城在今钟祥

前引《隋书·地理志》“竟陵郡”与“江夏郡”下原注的记载已反映出南朝宋齐以来的鄂州治所(夏口城)在长寿县(今钟祥)之说,至唐初编定《隋书·地理志》之时,还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古夏口城在今钟祥之说,在宋代以后的有关文献中也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太平寰宇记》卷 144 鄂州“长寿县”、《輿地纪胜》卷 84 京西南路鄂州“景物”栏都提到当时的长寿县有“偃月城”,并称“城三面,漳水壅矣”。《大明一统志》卷 66 沔阳州“古迹”栏则有“却月城”,原注

云：“在江口，即汉末黄祖所守者。”黄祖为刘表部将，所守即夏口城，自当包括其南面的外围据点却月城（亦称偃月城），《大明一统志》却以钟祥南、在明沔阳州（包括景陵县，即今之天门县）之位于“江口”的却月城当之，亦可见直到明代，当地人仍有夏口南面的却月城在今钟祥南的传说。

四、夏口之名何时由钟祥迁移至今武汉市？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已可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齐梁时的夏口城当在今钟祥境，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汉市，而隋唐以后“夏口”之名却一直在今武汉市。然则，夏口之名何时由钟祥迁移至今武汉市？

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答是：隋唐宋时鄂州之夏口，当是梁陈之际重立郢州于今武汉市时，后起的同名城镇。换言之，夏口之名由钟祥迁移至今武汉市，发生在梁陈之际的大变乱之中。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当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恭帝元年、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冬至翌年春西魏军队攻取江陵、覆灭梁元帝政权的同时，北齐清河王高岳奉命也率军南下，与西魏争夺江汉地区。高岳至义阳（当为当时司州之南义阳郡，位于今湖北省孝感市境^②），江陵已陷，因进军临“江”（汉水），梁郢州刺史陆法和举州降。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正月甲午，高岳北还，留部将慕容俨戍守郢州（夏口城）。按：此时之郢州仍当在今钟祥。当时高岳出兵以援救江陵（在今宜城南境）为名，若郢州在今之武汉市，去江陵过远，又不在赴江陵道上；若在今钟祥，则距江陵已甚近，正与高岳所宣称之目标相符。慕容俨入居郢州城不久，就受到梁将侯瑱、任约、徐世谱的围攻，困守近半年，始弃城北归，梁军侯瑱也撤往下游，此后郢州地当转属西魏。这一次郢州攻防战，使郢州受到一次巨大破坏。《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记此次郢州攻守战云：

（慕容俨）始入（郢城），便为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俨随方备御，不能克。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获洪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瑱移军于城北，造柵置营，焚烧坊郭，产业皆尽。约将战士万余人，各将攻具，于城南置营垒，南北合势。……夏五月，瑱、约等相与并力，悉众攻围。城中食少，粮运阻绝，无以为计，唯煮槐楮桑叶并纴根、水萍、蒿、艾等草及靴、皮带、觳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噉，唯留骸骨。……后萧方智立，

遣使请和，显祖以城在江表，据守非便，有诏还之。

此役之惨烈与破坏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盖郢州（夏口）在此役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北齐军北撤后，梁军也向下游转移，而不再据守这一地区。据《资治通鉴》（卷166）记载，在这之后，梁鄱阳王萧循为郢州刺史，次年8月，循卒，弟丰城侯泰继之。九十月间，湘州刺史王琳袭据郢州。萧循、萧泰以及王琳先后所据之郢州，看来已非在今之钟祥市，而应在今武汉市。《资治通鉴》卷166梁敬帝太平元年八月己酉条记：“鄱阳王循卒于江夏。……王琳使兖州刺史吴臧攻江夏，不克而死。”这里称郢州治为“江夏”而不称“夏口”，也曲折地反映出郢州治所很可能已不再今钟祥之古夏口城，而东移至今武汉市的武昌区了。至陈武帝永定元年（后梁大定三年，公元557年），陈霸先遣侯安都等进攻王琳，军至武昌（在今鄂州市），王琳部将樊猛弃城走，安都军进围郢州，“未克，而王琳军至涘口，安都乃释郢州，悉众诣沌口，留沈泰一军守汉曲。安都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安都据西岸，乃合战，安都等大败。”沌口当在今汉阳县境，自古无异辞^③；当时的郢州在沌口之东，显然已在今武汉市。因此。可以相信，夏口之名由今之钟祥市迁移至今武汉市，应当就在公元556、557这两年间。

五、结 语

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夏口城的地望所在及其地望之变迁，是古代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又一个核心问题，也是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流行说法一直认为汉末六朝时的夏口城即在今武汉市，从而将它作为武汉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并常常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与区域格局。本文的研究虽仅是初步，但它至少提示我们，这一论点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可能是错误的。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初步排除了东汉末至梁陈之际300多年间夏口城在今武汉市的说法，而将其位置定在钟祥市。联系到武汉历史地理的全面研究，我们注意到：汉魏六朝时期，今武汉一带的中心城市是今鄂州市（三国以来，直到民国初年，都称为“武昌县”）。梁陈之际，原在钟祥境内的郢州治所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后，重新控制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陈王朝复于今武汉市武昌区设立郢州及江夏郡；迨隋灭陈统一，郢州改称鄂州，附郭首县被定名为“江夏县”（县名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今武汉市武昌区才逐渐兴起，并取代武昌县（今鄂州市）成为

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武昌县的地位则逐渐下降,成为鄂州的属县之一。弄清这一演变过程,对于武汉历史地理与城市发展演变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注 释:

- ① 黄鹤楼之名,在今存记载中最早见于中唐时崔颢之《黄鹤楼》诗。《南齐书》卷 15《州郡志》下则仅有“黄鹤矶”。“鹤”与“鹤”通,但尚无“黄鹤楼”。
- ②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孙策击败袁术部将刘勋后),遂前进夏口,攻黄祖。”又引《吴录》载孙策破黄祖后上表汉帝曰:“臣讨黄祖,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据此可知,当时之夏口即沙羡县,而沙羡县则为江夏郡属县,见《后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沙羡”县条。另,《晋书·地理志》荆州武昌郡“沙羡”县原注:“有夏口,对沔口,有津”,亦可证。
- ③ 《续汉书·郡国志四》豫州“庐江郡”下原注云:“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东汉时安丰县既属庐江郡,故郑玄谓大别在“庐江安丰县。”其含义与班固所说并无不同。郑注见《史记·夏本纪》卷 2,裴骃《集解》所引。
- ④ 《史记·夏本纪》卷 2“内方至于大别”句下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 册,第 69 页
- ⑤ 参阅洪亮吉《大别山考释》,见民国《湖北通志》第一册,卷 6,《舆地志六》山川“大别山”条注,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本,第 369—370 页;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 3,《禹贡第三下》“过三澧,至于大别”句下注疏。
- ⑥ 参阅杨守敬《禹贡本义》“大别”条,见《杨守敬集》第 1 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3—75 页;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 28《沔水篇下》“但今不知所在矣”句下“守敬按”,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19—2420 页。
- ⑦ 参阅崔述《夏考信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2—4 页,关于《禹贡·导山》二条,论述导山部分皆指山脉而言;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 1 辑,第 34—35 页,“内方至于大别”句下的注释(二),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 ⑧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 76 湖广二汉阳府汉阳县“大别山”条,汉川县“小别山”条;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338 湖北汉阳府山川“大别山”条、“小别山”条。
- ⑨ 《禹贡》郑玄注曾四次引《地说》,可知此书必早于东汉后期。参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 2,第 33 页;卷 3,第 38、40、41 页。
- ⑩ 洪亮吉的全文见民国《湖北通志》卷 6《舆地志六》“山川”一,第 369—370 页。原文当出自《洪江北集》,惜未获见。
- ⑪ 参阅《通典》卷 183《州郡十三》鄂州(江夏郡)总叙;《元和郡县图志》卷 27 江南道三“鄂州”总叙;《太平寰宇记》卷 112 江南西道十“鄂州”总叙。
- ⑫ 参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卷 9“江夏郡”、“竟陵郡”及汉东郡下“土山”、安陆郡下“富水”诸条。
- ⑬ 《元和郡县图志》卷 21 山南道二“鄂州”下引《周地图记》云:“蛮人酋田金生代居此地,常为边患。梁普通末,遣鄂州刺史元树讨平之,因置新州。”梁武帝普通年号共有七年,普通七年为公元 526 年。明年三月,始改元大通,则“普通末”当指大通元年(公元 527 年)三月以前。
- ⑭ 参阅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卷 14 上,“又东为沧浪之水”句下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41—545 页;《水经注·沔水篇》的武昌县沧浪洲部分;顾颉刚《禹贡》注释,见前揭《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 1 辑,页 40,注释(二)。
- ⑮ 三澧,《尚书》孔《传》认为是水名,东汉郑玄定三澧在江夏竟陵县界,晋宋时刘澄之亦主此说。后世因袭,定在今湖北京山、天门县境的汉水滨。参阅《尚书正义》卷 6,《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读史方輿纪要》卷 77 湖广三安陆府京山县“澧水”条,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342 湖北安陆府山川“澧水”条。而《水经注》卷 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则谓三澧在汉代的南郡邳县北,是汉水上的三处水边地。后世主此说较著者如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卷 14 上曾对以三澧为水名的竟陵说提出驳议,并据许慎《说文解字》及汉魏六朝时人的论述,释“澧”为水边有堤防之高地,“三澧”为“汉水之大防”,认为“三澧当在清水入汉处:一在襄城北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江口东,皆襄阳县地,在邳县北,言在竟陵者非是。”(前揭本第 545—548 页)。拙作《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荆楚地理》对此曾有详考,请参阅前揭《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 386—387 页。
- ⑯ 见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 1962 年排印本,卷 7,地部下,汉水第二,“赋”所引。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 1958 年影印本)页 852,卷 69 所引《汉津赋》“曼山”作“万山”。按:曼、万音通,所指实一,参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346 湖北襄阳府山川“万山”条。
- ⑰ 参阅《水经注》卷 35《江水篇三》,《晋书》卷 85《刘毅传》,《梁书》卷 1《武帝纪上》,以及《太平寰宇记》卷 130 淮南道九汉阳军汉阳县“却月城”条所引《荆州记》,等。
- ⑱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 78 荆州府江陵县“夏水”条、监利县“鲁状江”条,卷 77 沔阳州“长夏河”条;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344 湖北荆州府山川“夏水”条,卷 338 汉阳府山川“夏水”条,等。
- ⑲ 参阅《宋书》卷 37《州郡志三》鄂州“巴陵太守”,及江夏太守“沙阳男相”、“蒲圻男相”条。
- ⑳ 关于孙吴未省废沙羡县,请参阅《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赤乌二年“五月,城沙羡。”又,《吴书·程普传》(卷 55)“领江夏太守”。㉑ 参阅《南齐书》卷 15《州郡志下》鄂州“江夏郡”条,《水经注》卷 35《江水篇三》。
- ㉒ 参阅《南齐书》卷 15 司州“南义阳郡”。按:齐梁司州志义阳郡治孝昌,原属江夏郡;另有南安、义昌二县,与齐安郡所领县重合。南安县,《宋书·州郡志》属于西阳郡,是刘宋元嘉二十五年(公元 448 年)以豫部蛮民所立十八

县之一。齐义阳郡兼有刘宋江夏、西阳两郡属县,必处于二郡交界地区。《隋书·地理志》安陆郡“吉阳”县原注云:“……又梁置义阳县,西魏改为南司州,寻废。”隋吉阳县在今孝感西北境,自古无异辞;孝昌在吉阳南,则也当在今孝感境。

②③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76湖广二汉阳府“沌阳城”条,“沌水”条;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38湖北汉阳府古迹“沌阳故城”条,山川“沌水”条。

[参 考 文 献]

- [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石 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3] 石 泉,鲁西奇.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2,4).
 [4] 石 泉,蔡述明.古云梦泽新探[M].武汉:湖北教育出

版社,1996.

- [5]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2).
 [7] 朱 诚,等.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全新世环境考古与异常洪涝灾害研究[J].地理学报,1997,52(3).
 [8] 石 泉,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探[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2(6).
 [9]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5,(12).
 [10]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J].考古,1959,(4).
 [11] 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张 琳)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Ancient Xiakou

SHI Q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I Quan(191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 and traditional conclusion that ancient Xiakou was situated in present Wuhan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occasion of the Liang Dynasty and the Chen Dynasty is wrong. By virtue of original documents, especially relevant records written by the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Han Dynasty, the Wei Dynasty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with a careful study on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a series of relevant place-name, we get the result that ancient Xiakou city was situated really in or a bit South to Zhongxiang. Because of the upheaval in the occasion of the Liang Dynasty and the Chen Dynasty, Xiakou was destroyed destructively. After then, the name of 'Xiakou' moved from Zhongxiang to Wuhan.

Key words: Xiakou; geographical position; Wuhan; Zhongxiang